

中共與蘇聯關係的展望

姚孟軒

一

中共與蘇聯由盟友變成仇敵，時張時弛的冷戰狀態，至今已延續將近十七個年頭；一九六九年珍寶島事件以來，更出現軍事對峙局面，成爲國際政治的重要問題，其動向爲舉世所關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人們熱衷於討論毛蘇間長期衝突和戰爭的可能性，最近一兩年，又將注意力轉向於毛澤東死後，它們是否有和解可能。論者各抒所見，對這兩個共產強權是和是戰、還是把目前這種不戰不和的局面長時期持續下去？提出很多不同的看法。

研究北平與莫斯科關係的未來動向，先要追本溯源，對它們由合而分的原因，作一分析。綜合有關這一問題的研判意見，便可看出中外學者專家認爲毛蘇對立的主要原因約有(一)國家利益的衝突，(二)意識形態的分歧，(三)共產世界領導權的爭奪，(四)心理及個人因素的影響。他們有的專重或偏重其中某一因素，有的就兩個或兩個以上因素作綜合研究，並觀察這些因素最近發展傾向，推斷今後的可能變化，從而得出各種不同的結論，都能够言之成理。

不過，回顧過去，這幾個對立因素，在毛蘇兩黨和兩個政權關係中久已存在，北平政權成立以前，兩黨關係並未發生重大變化，且在一九五〇年代，兩個政權還保持十年不算壞的同盟關係。故雖有同樣對立因素，中共與蘇聯有時候會結成盟友，有時候又變爲仇敵，是可能的。問題在於：這些對立因素及其變化，在何種情況下不致破壞它們有效的同盟關係？又在什麼情況下這種關係無法再繼續維持下去，並翻臉成仇？使它們由合而分的直接原因爲何？

二

中共與蘇聯關係五十多年的歷史，有聯合也有爭鬥。一九二一至三五年，中共與受蘇共操縱的第三國際，有過多次權力和政策爭執。這些爭執都在暗中進行，通常由中共屈服而結束，唯一例外是李立三事件。有人認爲這次事件是「莫斯科與一個決心要將中

國放在首要位置的中國領導之間，發生公開衝突的第一個事件^①。」這說得很對，但要補充的是：此一事件不單是中共公開反抗莫斯科的第一次，也是直至一九六〇年代毛蘇分裂以前，在四十年長時間內僅有的一次。其結果是李立三被召往莫斯科接受批判，並留在那裏「糾正」他的錯誤。他在蘇聯「糾正」了十五年，才被放了回來。

一九三五年毛澤東當權後，採取與前人不同的方法對待莫斯科。從遵義會議到一九四九年中共偽政權成立，在這段時間，他不像陳獨秀那樣軟，爭吵到最後總是順從莫斯科的意志；也不如李立三那麼硬，竟樹起叛旗，公然向莫斯科的權威挑戰。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提到與蘇聯的關係說：他從遵義會議就「沒有聽第三國際的」^②。這話不足憑信。一九三〇年代中期，毛澤東握有很大決策權力的中共，決定停止武裝叛亂，改採抗日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就是遵照第三國際七次大會的決議；而宣佈這一重大轉變的「八一宣言」，更是由陳紹禹在莫斯科所草擬，在國內的中共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事前都毫不知情^③。

一九三〇年代末期，毛澤東倡導馬列主義中國化^④，後來並形成為「毛澤東思想」，列入一九四五年中共七次大會的新黨章，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在此期間，毛又整垮他的最大反對勢力國際派，在「七大」確立以他為中心的新領導體制。這兩件事都是為了建立和鞏固毛在黨內的權力地位，但也牽涉到與蘇聯的關係。初創時期的毛澤東思想，只是把列寧、史達林建築在階級鬥爭說基礎上的階級革命論和暴力革命論，用國產材料裝潢起來，它形式上是中國的，實質上却是蘇聯的，毛並無意背離莫斯科。然而，他提倡按照中國的特點應用馬列主義，也就是要自行註釋馬列主義，開闢一條屬於自己的革命道路，爭取理論與政策的相當自主權。但在那個時候，理論解釋權及決策權早已為克里姆林宮所獨佔，史達林不會讓毛澤東來分享。

其次，一九三〇年代中期，史達林已確定毛澤東在中共的領袖地位，並指示陳紹禹幫助毛克服缺點，成為健全的領袖^⑤。這個「幫助」，也含有監視和牽制的用意。史達林的計劃，是由國際派「幫助」毛澤東，替中共建立一個聽命於莫斯科的領導班底。這一計劃未能實現。對史達林的指示，毛和國際派都陽奉陰違，各取所需。毛利用史達林欽定的領袖地位抓取權力，惟不肯容納國際

① 此係希拉姆(Stuart Schram)在其主編之「中國的權威、參與及文化變革」(Author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一書所說。引自柴格利亞(Donald S. Zagoria)·「毛在中蘇衝突中的角色」(Mao's Role in the Sino-Soviet Conflict)——「太平洋事務季刊」(Pacific Affairs)第四十七卷第二期(一九七四年夏季號)。

② 毛澤東：「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九年八月版，五五三頁。

③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三冊，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六月增定版，七二頁。

④ 毛澤東第一次提到馬列主義中國化問題，見「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係毛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報告，刊於「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⑤ 同③一四八頁。

派；陳紹禹則只想「幫助」毛做個掛名領袖，而由他來掌握實權。這就引發兩者間激烈的權力衝突，結果是毛鬥垮了國際派，陳紹禹被排出中央政治局，從此喪失權勢。毛這樣做雖是爲了爭奪中共領導權，不是對付莫斯科，不過，國際派乃克里姆林宮培植的親蘇勢力，整掉這股勢力，必然傷害到毛蘇關係；對牽涉個人權力的重大問題，毛的表現是敢作敢爲，不怕得罪蘇聯。

但另一方面，毛澤東仍在盡力設法減輕這種傷害，並將他同莫斯科的關係拉得更親近一些。就在倡行馬列主義中國化、狠狠打擊國際派這段時間，毛一再以言論和行動向克里姆林宮表達其忠誠，聲明他「完全出於誠意」的「敬愛」史達林，擁護史達林及其「給人類指示的方向」^⑥；接着又在爲中共所撰綱領性文件「新民主主義論」中，根據史達林的理論，把中國革命歸屬爲「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中國要站在蘇聯的一面。他在「七大」所提爲準備迎接抗戰反攻階段，必須全力奪取東北的戰略計劃，更主要着眼於東北同蘇聯接壤，佔據東北可以取得莫斯科的大量援助，建成後方不虞被攻擊的強固根據地^⑦，這更是要建造對蘇聯的深切依存關係，把奪取政權的希望寄托於蘇聯的支援。

在這個時期，莫斯科對處理與中共關係的問題也很謹慎，並沒有對毛澤東採取強烈制裁行動。在中日戰爭期間，蘇聯致力改善與國民政府的關係，以軍經援助給予國民政府，對中共却持冷淡態度。但這是基於蘇聯聯合中國、牽制日本的策略需要，而非懲罰毛澤東。如果這是一種懲罰，甚至是表示蘇聯已拋棄中共，轉而支持國民政府，毛不可能毫無反應，但事實上，他從未爲此事埋怨過莫斯科，毛更不可能在被懲罰或拋棄後仍然決定奪取東北，依存蘇聯。相反的，在作這一重要抉擇時，毛蘇間必仍保持良好關係，毛並已獲得可靠保證，深信這種友好關係還會繼續維持下去，深信蘇援是可以依賴的。

克里姆林宮的謹慎和寬容，可能由於蘇聯要集中精力同希特勒作戰，無暇顧及中共問題；毛的親蘇姿態，使史達林認爲還能夠降伏他，將之收歸己用；史達林也不相信毛能以擺脫其控制。更重要的是：毛雖然有些倨傲不馴，但依然執行第三國際的路線，他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符合蘇聯的利益。

抗戰勝利後，史達林授意中共放棄經由武裝叛亂奪取政權的計劃，與國民政府合作，毛澤東沒有聽從^⑧。這是毛第一次在重大政策上違抗莫斯科，惟這一事件並未嚴重影響毛和蘇聯的關係。毛仍舊全力推行謀奪東北的軍事計劃，佔領東北廣大地區的蘇聯軍隊，則配合中共，一面阻撓國軍行動，一面放進十萬共軍，並將蘇軍佔領區交由共軍控制，從軍事、經濟等各方面援助其建立武裝

⑥ 毛澤東：「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一九五二年八月重排版，六五一頁。

⑦ 「共匪叛亂策略之若干問題」——「問題與研究」叢書之三十六，國際關係研究所，中華民國五十年六月版，三頁。

⑧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澤東思想萬歲」四三三頁。

⑨ 鮑里索夫（O. B. Borisov）、柯洛斯科夫（B. T. Koloskov）合著：「蘇中關係（1945—1970）」第一章第三節，彭士誇中譯本，中華民國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料室。

割據^⑨。蘇聯還以日本關東軍「第一流的武器裝備」，替中共訓練成林彪的第四野戰軍^⑩。一九四八年秋季至四九年春季，造成軍事上強弱易勢的東北、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前兩個戰役都是「四野」打的。設如不能佔據東北，中共的軍事叛亂即使不致失敗，也不會這樣快獲得成功；其成功乃得力於蘇聯的援助。

然而，一九四五至四九年的毛蘇關係，還存在另外一些截然不同的情況。史達林同國民政府簽訂友好條約，保證將蘇聯對中國的精神支持、軍事及其他援助，完全給國民政府，並保證不干涉中國的內政。在一九四六年夏季以前將近一年期間，莫斯科的報紙特別漠視中共，毛澤東好像已被貶入冷宮^⑪；而在此前後，史達林和他的外長莫洛托夫，還向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高階官員，說過不少貶損毛與中共的「悄悄話」，譬如：中共不是正統共產黨、蘇共與之並無親密關係，毛不可能統一中國等。這又顯示，毛蘇關係不是和諧的，莫斯科對延安還含有幾分冷漠、輕視及敵意。

這一時期的毛蘇關係，顯著存在這種既有聯合、又有矛盾的現象。史達林反對中共從事軍事冒險，但仍然給以大力援助。不管蘇聯援助中共是基於國家利益，企圖促成東北的特殊化，還是爲了盡一點共產黨人的國際主義義務，都違背對國民政府的正式承諾。其次，史達林曾批評毛澤東不懂馬列主義，對毛的尾大不掉更感不快，他所表露的冷漠、輕視和敵意，也許有些誇張，但絕非造作。可是，援助未受影響，批評與責難也有節制，中共並未受到多大損害；而延安的笑臉加上莫斯科的悄悄話，使華盛頓以爲毛蘇勾結可以拆散，毛可以變成東方的狄托，靠攏美國。這樣一來，克里姆林宮的冷漠、輕視與敵意，反有利於中共施展中立美國的計謀，受其害的却是國民政府。這不能說史毛在串演雙簧，合理的解釋應該是：毛蘇關係矛盾的兩面中，聯合是主要的一面；以聯合爲主要的一面，雙方乃能在有嚴重爭執並各行其是狀態下，仍維持良好合作關係。

形成這種矛盾關係的主要原因爲：(一)毛澤東的反控制鬥爭，僅在爭取有限自主權，不在背叛莫斯科，更不具備足以威脅史達林統治地位的實力，權力衝突沒有惡化至必須攤牌的地步。(二)「毛澤東思想」已經出籠，但它的基調還是史達林的，思想分歧限於策略這個較低層次，意識形態中合的因素仍大於分的因素。(三)史達林不贊成中共的軍事叛亂，是因爲他不相信軍事叛亂能够成功，不是偏袒國民政府；他容忍毛澤東違抗命令，不制止其軍事冒險，是因爲毛掀起戰亂，使中國陷於分裂狀態，對蘇聯有利無害。史達林當時的抉擇，按其優先次序，首謀使中國的內戰和分裂長期化，並從中取利；而幫助處於劣勢地位的中共佔據東北，就含有這兩種用意。其次是讓與莫斯科比較接近的一方贏得勝利，儘管毛澤東不很可靠，畢竟是血濃於水，兩相權衡，由毛統治中國，總比反

^⑩ 同^⑨十三頁。關於蘇聯交給中共日製武器的數字，據一九七一年八月廿六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蘇軍粉碎日本侵略軍是中國革命取得最終勝利的保障」透露：計有七十多萬枝步槍，將近一萬四千挺機槍，四千二百多門大砲和迫擊砲，七百多輛坦克，八百個彈藥庫。使中共軍隊迫擊砲增加一倍，步槍和機槍增加兩倍，大砲增加三倍，彈藥增加十九倍以上，並首次獲得坦克、飛機和軍艦。另「一九六五年蘇聯科學院「歷史問題」(Voprosy Istorii)月刊第八期，刊有杜賓斯基(A. M. Dubinsky)所作「蘇聯(一九四五年)解放遠東的使命」一文，對蘇聯於日本投降後在東北援助中共及裝備林彪部隊的情況敘述頗詳，可參考。

^⑪ 麥爾爾特(Klaus Mehnert)·「北平與莫斯科」(Peking and Moscow)趙先運中譯本，二六九頁，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料室。

共的國民政府對蘇聯來得好些，他因而只好把賭注押在中共這一邊。最後，史達林雖大力援助中共，但一九四八年戰局轉化以前，一直認為毛的軍事計劃將徒勞無功¹³，因之，他需要維持同國民政府的友誼，以免兩頭落空。基於這些考慮，史達林的對華政策是腳踩兩條船，表面上把重心放在右邊，支持國民政府；實際把重心放在左邊，支持中共。¹⁴毛澤東根據奪取政權的需要及意識形態的援助，而不可能指望它援助中共從事武裝叛亂。即連當中國與蘇聯的國家利益發生衝突，他也是根據這兩個因素決定態度，從未混淆敵友界限。中共認為莫斯科搶走東北的工業設備是對的，因為這些設備如果不是被蘇聯（朋友）搬往西伯利亞，就要落到國民政府（敵人）的手裏¹⁵。在這以前，延安為史達林與日本簽訂中立條約曲意辯護，鼓掌叫好，並把譴責莫斯科這一損人利己行為的人們，都說成是「親日派」和「頑固派」¹⁶，更表現為忠實的國際主義者，把意識形態看得比國家民族利益還要重要。但這種國際主義表現，也是為了黨的利益及奪取政權的需要。在毛澤東看來，日蘇中立條約加諸中國的困擾和傷害，首當其衝的是他的主要敵人國民政府，對中共利益並無影響，他不能為只對敵人不利的事，開罪蘇聯朋友。毛避開國家利益這個最敏感的問題，遷就莫斯科，是他在黨際關係上冒犯史達林，而仍能贏得史達林支援的主要原因。

三

一九四九年六月底，在中共政權成立前夕，毛澤東公開宣佈向蘇聯「一邊倒」，隨後的行動又表明，他的「一邊倒」包括：（一）與蘇聯締結以美國為假想敵的軍事同盟，將「國家安全」依託於莫斯科的保護；（二）在內政方面「走俄國人的路」，向蘇共這個「最好的先生」學習¹⁷，並建立對莫斯科的經濟依存關係，依賴蘇聯援助建設工業化；（三）在對外關係方面，參加蘇聯為首的共產國家大家庭，對外活動依循大家庭的統一路線。這種「一邊倒」，簡直是使自己成了莫斯科的附庸。

有人將毛澤東之向蘇聯「一邊倒」，歸咎於美國敵視中共，甚至歸咎與杜魯門總統否決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六月底的北平之行。但事實上，毛的倒向莫斯科，繼續與西方為敵，早在這年三月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就已確定¹⁸。而在此期間，美國對中共的態度，至少比蘇聯要友善得多。共軍渡江佔領南京，司徒雷登大使留在那裏，沒有隨國民政府一同撤退。根據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的研究報告，五月十三日至六月二十八日，司徒雷登與黃華有多次接觸。毛事後透露，華盛頓「希望開設新店」，並提供經濟援助，

¹² 同¹¹，二六八頁。

¹³ 同⁹，一〇頁及¹¹二七四至二七五頁。

¹⁴ 中共中央：「關於蘇日中立條約的中共意見」（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六日），引自郭華倫：「中共史論」第四冊，三三三頁。

¹⁵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一九六〇年九月北京第一版，一四八六頁。

¹⁶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選」第四卷。

其條件是要中共「跟我（美國）走」¹⁷。他還透露，美國要求的「跟我走」，只是要中共「擺脫外國（蘇聯）的羈絆」，即狄托化，或許再加上對內比較溫和一些，并非要他像對莫斯科那樣一邊倒。毛堅持倒向蘇聯，拒絕狄托化，談判因而失敗。接着美國發表白皮書，毛在一個多月時間內陸續撰寫五篇評論，對這個「實質上對他有利無害（至少是利多於害）」的文件猛烈抨擊¹⁸。在這前後，他又拘禁美國駐上海副領事奧立佛（William M. Olive）、駐瀋陽總領事華德（Angus Ward），採取一連串激烈反美行動。儘管如此，華盛頓仍然決定要承認中共，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杜魯門總統並聲明「美國將不對在臺灣的中國軍隊提供軍事援助或顧問」，艾奇遜國務卿也說：「不會有任何方式在臺灣問題上行使軍事干預」，向北平大送秋波。但毛依舊以惡聲回報白宮的笑臉，並繼續留在莫斯科忍受史達林的白眼，商談簽訂反美盟約的問題。直至爆發韓戰，美國的政策才作劇烈轉變。

蘇聯與美國恰好相反，在這段時間，蘇聯對中共却顯得很冷淡。南京失守，蘇聯駐華大使羅斯（N. V. Roschin）隨國民政府前往廣州，直到中共政權成立的第二天，才奉命撤退，轉赴北平就任大使職務。莫斯科真理報對中共的軍事進展，僅平鋪直敘作簡短實況報導，從未加渲染及贊許。即連北平政權成立兩個半月以後，毛澤東率領龐大代表團，攜帶致送史達林的豐厚壽禮訪問莫斯科，也受到相當冷漠的待遇，蘇聯報紙上有時一連幾天不登毛的消息，使人不知道他去了那裏。毛與史達林的談判也不順利，他多年後才吐露談判的內幕說：史達林不同意簽訂同盟條約，還提出很多要求，他的態度「一條是你提出的，我不同意者要爭，一條是你堅持，我接受」¹⁹。如此委屈退讓，仍要經過將近兩個月的討價還價，才談出結果。

毛澤東以甘居附庸地位的「一邊倒」，外加應允蘇聯共同管理中長鐵路、共同使用旅順海軍基地及大連港、共同開採新疆的有色與稀有金屬（主要是鈾礦）、共同經營民用航空事業，才換得史達林保護其安全的承諾，以及只有三億美元的經濟援助。而這筆撥款，絕大部份還是用來購買蘇聯的軍火，去打韓戰²⁰。假如他改向美國打交道，則只要與莫斯科疏遠一些，即可不必犧牲那麼多權益，也不必向任何強國一邊倒，獲得可能遠較蘇援為多的美國援助。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曾支援狄托，消解史達林的軍事威脅，假如毛澤東選擇狄托化，也是能够得到同樣支援的，無需顧慮安全問題。兩相比較，純就「國家利益」考量，自應捨蘇取美，毛不此之圖，顯然另有原因。

從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對為何「一邊倒」的解釋不難看出，他是師承列寧、史達林兩個陣營的世界觀，首先肯定中共應該站在共產陣營的一邊，然後再考慮自己在共產陣營的地位，以及如何從這個紅色世界獲取安全保障、經濟與其他援助。

¹⁷ 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毛選」第四卷一四九九頁。

¹⁸ 這五篇文章都刊於「毛選」第四卷，除①外其餘四篇的題目是：「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不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¹⁹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澤東思想萬歲」一六四頁。

²⁰ 見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信，引自尹慶耀：「中共外交與對外關係」——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民國六十二年六月初版，六八頁。

而在那個時候，共產世界是史達林的世界，中共又是用史達林主義的奶水餵大的，早已確定按照史達林主義的模式，改造和建設自己的國家；他依靠蘇聯援助奪得政權，他的新政權迫切需要的各種支援，在共產世界中也只有從蘇聯能夠取得。這些因素，使毛無法離開莫斯科，在共產陣營自立門戶，他既然決心留在這個陣營，除了自居附庸、犧牲權益，換取史達林的友誼之外，實別無選擇。

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強調「不要忘記東方」的史達林，無論基於國家利益或世界革命的需要，都希望有個在其羽翼下的共產中國。他的僚屬曾說過：蘇聯與共產中國聯盟，「在遠東將成爲最大的世界性要素」²²。依照莫斯科的說法，一九四五至四九年援助中共取得政權，已爲嗣後的合作關係提供「重要前提」，且已奠定基礎²³，自然不會讓這隻衰熟的鴨子跑掉。史達林雖然懷疑毛澤東有可能變成狄托²⁴，但他的冷淡，像是家長對不聽話子弟的一種懲戒，要孩子學乖一些。從「一邊倒」到參加韓戰，毛以反美博取史的歡心，顯得相當馴服；史則從冷淡到韓戰，用欲擒故縱的手法，把毛捆綁在反美的戰車之上。黑魯曉夫的回憶錄透露：史毛會談由於史達林的武斷和專橫，曾瀕臨破裂邊緣，只有在他們一同將敵對箭頭指向美國的時候，才沒有真正決裂。毛澤東則說：從中共參加韓戰開始，史達林才相信他不會變狄托²⁵。由此可見，毛蘇聯盟是建築在反美的共同基礎之上，而這個共同基礎，是用意識形態，現實利益兩種材料所建造，在中共更是以意識形態爲主。

毛澤東的「一邊倒」及參加韓戰，在亞洲形成中共和蘇聯結盟，與美國爲敵的長期戰略對峙局面，延續將近二十年之久。一九六九年蘇聯科學院編著的「今日中國」，將這二十年的毛蘇關係劃分爲三個基本時期：一九四九至五七年的密切合作時期，五八至六〇年的醞釀轉變時期，六〇至六九年的惡化與接近決裂邊緣的時期。這種分期方法可以採用，但有些地方應略加修改。

在史達林活着的時候，北平與莫斯科的「合作」關係，實質上是控制與被控制的附庸關係。一九五六年三月，黑魯曉夫去華沙參加貝魯特（Pseudo Bierut）的喪禮，曾在一項短暫集會中指摘史達林對中共要求過多，並堅持對中共內政有決定權，一派殖民主義作風。中共在此期間也無獨立外交可言，即連毛澤東一九四九年底在北平召開亞澳工會聯絡會議，企圖利用他武裝叛亂的成功經驗，指導這一地區的共黨活動，也被斥責爲「覬覦亞洲革命運動的領導權」，他向印尼及印度共黨推銷他的暴力革命路線，更遭到史達林的「堅決反對」²⁶。

²¹ 鮑斯卡倫（Anthony T. Bouscaren）著「共產帝國主義」一書中所引蘇聯外交家曼紐爾斯基（Dmitri Manuilsky）的話，見劉光炎中譯本，世界書局版，四二頁。

²² 同①一頁。

²³ 同③。

²⁴ 同⑧。

²⁵ 同⑨九三至九四頁。

史達林死後，克里姆林宮的新主宰放鬆對中共的控制，由史毛簽訂的幾個不平等條約，除了中長鐵路管理權，已在一九五二年底移交給中共外，其餘旅順海軍基地管轄權的讓渡及撤退蘇聯軍隊，各營公司蘇方股權的轉讓，都是黑魯曉夫一九五四年秋訪問北平時才達到協議的。一九五四至五九年，莫斯科給予北平的經濟援助，也遠較史達林時代為多。一九五五年又協助中共建造第一座原子能反應器及迴旋加速器，兩年後復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協助其發展核武器。從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開始，北平在外交方面也有了相當自主權，並甚為活躍。黑魯曉夫將中共的附庸地位沖淡，給以較為平等的待遇，毛澤東也投桃報李，對莫斯科的新統治者頗為忠誠，黑魯曉夫與毛之間確有過一段蜜月時期。

黑魯曉夫清算史達林，使他與毛澤東的蜜月發生齟齬。毛把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比喻為「兩把刀子」，清史是丟掉史達林主義這把刀子，而「和平過渡」，經過議會道路奪取政權的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②。此外，否定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也必然損害毛在中共的偶像地位。毛及北平的其他領導人，為此曾在十個月內向蘇共六次提出異議^③，一九五七年一月，周恩來更在莫斯科對黑魯曉夫「尖銳批評，當面抬槓」^④。不過，毛在當時依然認為與蘇聯扯的是小皮，是「十個指頭九個一致，一個指頭不一致」，毛蘇關係反「比以前更靠攏更團結」，其對策也強調要「求同存異」^⑤。本此方針，在蘇共「二十大」後召開的中共「八大」，刪除黨章中有關毛個人迷信的條款，其所策定的內政外交路線，也大致符合黑魯曉夫主義，惟在鄧小平、劉少奇兩個報告中，又以影射方式批評黑魯曉夫反對個人迷信，鼓吹和平過渡是錯誤的。當東歐爆發反蘇浪潮，北平極力主張並支持莫斯科出兵鎮壓匈牙利革命，接着周恩來又受克里姆林宮的託付訪問東歐國家，遊說它們與蘇聯和順相處，並不計任何代價，維護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的團結。中共確曾「用極大的努力，維護了蘇共的威信」^⑥。黑魯曉夫則以增加對北平的援助作為報答，他還一度改變對史達林全盤否定的態度，認可史達林的名字，是和馬列主義不可分割的連在一起的。可見兩方都曾作若干讓步，避免因貶抑史達林引起的爭執，破壞他們的親密關係。事實上，在史達林事件以後，黑魯曉夫和毛蜜月還維持了二年多時間，才走向分離。

其後雙方由合而分，是由毛澤東先邁出第一步。從一九五八年秋季至五九年秋季這一年期間，他推行人民公社，挑起臺海戰爭，隨後又與印度在邊境爆發武裝衝突，這三項行動，導致中共內外政策脫離莫斯科軌道，甚至與黑魯曉夫路線背道而馳。毛這樣做並非早有預謀，如果他蓄意在史達林死後背離莫斯科，應該早在中共與蘇共發生嚴重思想分歧，蘇聯在共產世界的統治地位出現危

② 「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紀念偉大列寧誕生一百周年——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一日北平「人民日報」。

③ 「蘇共領導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北平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四月版，六九至七〇頁。

④ 毛澤東：「省、市委書記會議總結」（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澤東思想萬歲」八四頁。

⑤ 同④八三至八四頁。

⑥ 同④七五頁。

機的 九五六年，就與一些東歐國家採取聯合行動，而不應該放過這個有利機會，更不應該先幫助蘇聯穩定對東歐的控制，然後再單獨同蘇聯鬥。其次，毛選擇的行動時機一九五八年，兩黨間的思想分歧已趨緩和，北平除從莫斯科繼續獲得大量經濟援助外，並另獲得發展原子武器的援助。從這些關係的變化，找不出他作此抉擇的直接原因。毛的分離行為在最初僅限於政策上的自行其是，其分離原因也應從這一方面的變化中找尋答案。

中共一九五七年的鳴放運動仍然依循俄共廿次大會的黑魯曉夫右傾路線而發動，圖以鳴放代替個人崇拜，但是，鳴放激起反共怒潮，毛發覺已跟着黑魯曉夫走進一條死胡同，可能引發類似東歐共黨國家之反共暴亂，因而決定擺脫俄共「修正主義」，替北平政權另覓出路。毛是個比史達林還左的共產主義者，從反右派鬥爭、人民公社直到後來的文化革命，都是循左的方向謀化亂為治，尋求長治久安的途徑，他的自作主張，乃基於對北平政權安危治亂的考慮。其次，黑魯曉夫建議合組聯合艦隊，企圖加強對中共的控制³⁰，也可能刺激毛早下決心，向莫斯科爭取決策與行動的自主權。毛極富權力野心，他捨棄黑魯曉夫模式，要另創個毛澤東模式，也含有與莫斯科分庭抗禮，進一步取而代之的用心。不過，其行動仍極為謹慎，一九五八年抄，還告誡其幹部要信守國際主義原則，不要想搶在蘇聯前面進入共產主義，因為那「看起來不像樣子」³¹。毛首次公開表露奪取領導權的意圖，是在分裂幾乎已成定局的一九五九年十月，而他由劉少奇、鄧小平提出的要求，也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會主義革命，應遵循中共的道路³²。

在毛澤東顯露分離傾向的頭幾個月，黑魯曉夫的反應仍有節制。他對人民公社的批評限於隱晦暗諷，未作正面攻擊，當美國參議員韓福瑞揭露他指責公社的私下談話，他還力圖掩飾，反指韓福瑞是個扯謊的報童。對臺海戰爭，則在緊要關頭不表示態度，等局勢緩和才放馬後砲，聲言堅決支持中共³³。這種遲來的支援，顯示黑魯曉夫不願讓毛把他牽入與美國衝突的漩渦，但也顯示他仍想拉住北平，不打算馬上分手。一九五九年二月，他還給中共最後一筆經濟援助，以示安撫。惟黑魯曉夫的忍耐沒有維持多久，就改採強硬手段想使毛屈服。一九六九年二月，他片面廢除兩年前才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中止援助北平發展原子武器。他對中共與印度的軍事衝突，除授權塔斯社聲明表示遺憾及希望和平解決外，連像臺海戰爭中那種遲來的支援也沒有給予中共，反之，却給了印度巨額經濟援助。九月底，他又在北平公開教訓中共，不要用武力試探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中共並透露，這年八月的彭德懷

同³⁰。

³¹ 毛澤東：「在八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毛澤東思想萬歲」二六五頁。

³² 劉少奇：「馬列主義在中國勝利」——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出版的北平「紅旗」雜誌第十一期，一五頁；鄧小平：「中國人民大團結和世界人民大團結」——一九五九年十月二日北平「人民日報」。

³³ 金門砲戰發生一周後，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一日，「真理報」才發表觀察家文章，聲明蘇聯支持中共的「正義戰爭」，將給予必要的道義和物質援助。九月七日，時緊張程度已因周恩來建議與美國恢復華沙會談而減輕，黑魯曉夫才致函艾森豪總統，謂美國如攻擊蘇聯；十九日，又在致美國總統的另一封信中，警告美國如果對北平政權使用原子武器，必將受到同類武器的報復。——參閱 Klaus Mehnert: Peking and Moscow 中譯本四三三至四三六頁。

反毛事件，也得到莫斯科的鼓勵。一九六〇年四月，毛澤東挑起公開論戰，黑魯曉夫立即以牙還牙，在六月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圍攻中共，接着更將黨際爭鬥擴大到「國家關係」，全面切斷對北平的經濟援助，分裂至此已無可避免。

一九五〇年代後期，黑魯曉夫正利用鞭屍史達林，標榜黑魯曉夫主義，致力開創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黑魯曉夫時代，他不能容許毛澤東標新立異，跟他唱反調；也不能容許中共自成獨立王國，危害到蘇聯在共產世界的領導地位。他不容毛自行其是，乃基因於此。

由此可知，黑魯曉夫與毛之由合而分，肇因於基本利害的衝突。這種基本利害的衝突，係由很多因素交相激盪所形成，他們一個要自行其是，一個不容對方自行其是，這是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但這一次的控制與反控制鬥爭，雙方皆基於現實利益的迫切需要，並與意識形態的分歧有密切關連，因而極少迴旋餘地，其複雜性及爆炸性均非以往所能比擬。毛澤東在北平政權成立初期，曾忍受史達林的控制，這是因為他自知無力與史達林抗衡，也是因為他是史達林主義的信徒，以為唯有走俄國人的路才有前途，而一邊倒也可得到蘇聯的安全保障和經濟援助；他後來追隨黑魯曉夫，是因為爭端限於意識形態，中共從「國家關係」的改善中獲利甚豐，而清算史達林加諸他個人及中共的若干傷害，也可能設法減輕並取得補償。但一九五八年的情況根本不同，北平在鳴放與反右派鬥爭後急需化亂為治，毛又認為只有遠離「修正主義」，才是中共自救之道。對這攸關安危治亂的重大問題，他沒有退讓的餘地。

再看蘇聯，史達林昔年之能容忍毛的抗命及自行其是，是由於毛路線與黑魯曉夫主義及蘇聯利益相背馳，而他在共產世界的權力地位尚未穩固，東歐的反蘇風浪仍暗潮激盪，設若聽任北平的尾大不掉發展下去，必將為他本人和他的國家招致巨大災害，他也缺少退讓的餘地。衝突的嚴重性質及其發生的不利時機，乃使分裂成爲不可挽回。但是，假如中共的領導人不是毛澤東，對北平政權安危治亂的考量就會另有抉擇；而不具備史達林那種個人權威的黑魯曉夫，却企圖用比史達林更強橫的手段，壓迫中共就範，也因操之過急而鑄成大錯。人的因素對這一衝突的形成和激化，也有很大影響。

四

北平與莫斯科一九六〇年開始分道揚鑣。從這一年到現在十七年期間，中共對蘇聯的政策雖有多次改變，但其決策所依據的基本原則，始終是毛澤東所定「準備兩手，準備破裂，爭取拖」^⑤，也就是運用又聯合、又鬥爭的兩面政策，保持不戰不和的局面，爭取時間，促進雙方力量對比的有利轉化，並做好應變準備，在這同一時期，克里姆林宮對北平政策的變化，也依循一個不變的原則，即交替或同時使用軟硬兩種手法，使中共重新投入蘇聯的懷抱。這樣打打談談，毛蘇關係乃呈現長期僵持狀態。

⑤ 毛澤東：「在一個反修報告會上的插話」（一九六四年九月四日）——「毛澤東思想萬歲」五七八頁。

在分裂初期，毛澤東掀起公開論戰，以引蛇出洞，施以打擊³⁵，並藉思想論戰擴大影響，團聚國際共黨左翼勢力，與莫斯科分庭抗禮。黑魯曉夫則發動圍剿，在共產世界孤立中共，並利用邊境糾紛實施滲透³⁶，謀從這兩方面構成壓力，迫使毛澤東知難而退。與此同時，他又以恢復經濟與經濟援助，引誘北平與之重修舊好。在黑魯曉夫下台以前，雙方曾有多次商談，均無結果。黑某垮台後一度出現轉機，惟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的會談仍不歡而散。中共日後透露會談失敗的原因，在克里姆林宮的新領導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對待中共的問題上，同黑魯曉夫沒有絲毫差別³⁷。莫斯科則歸咎於北平堅持按照它的意見，修改蘇共綱領和政策，作為改善關係的先決條件³⁸。雙方都承認，意識形態分歧是癥結所在。毛在論戰中研究並修改馬列主義，逐漸形成一套左的戰略與策略理論，與黑魯曉夫主義更難相容。除此而外，斷絕援助的創傷猶存，蘇援對中共不具誘惑力，也是會談難以達成協議的重要原因。

在與蘇共新領導會談前夕，中共已確定以世界農村包圍及奪取世界城市的新世界戰略³⁹。新戰略仍以美國為主要打擊目標，但莫斯科已被排出革命陣營。會談失敗後，又宣稱與黑魯曉夫主義完全決裂，在政治和組織上同「修正主義份子劃清界限」⁴⁰。繼而提出反帝必須反修⁴¹，把蘇聯打成「社會帝國主義」⁴²，將之與「美帝」等量齊觀，併列為主要敵人；北平也取代莫斯科，成為「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⁴³。正如中共所自承，它在這個時期，是以國際主義為「對外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⁴⁴，即是將「國家利益」寄託於世界革命。毛想效法靠十月革命扭轉頹勢，開創新的局面的列寧，打出個屬於中共的紅天下，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推進到毛澤東時代。於是發動造反外交，輸出暴力革命，其攻擊箭頭主要雖然仍舊指向美國及西方世界，但對共產世界的滲透與分裂活動也大為增強。據北平的統計，截至一九六七年九月為止，蘇聯及其他修正主義國家中的毛派組織有五十三個⁴⁵。莫斯科也多方面加強行動，並企圖利用文化革命造成的政治混亂，使中共親蘇的「健康力量」得以成長。一九六七至六八年間邊境糾紛之變趨熾烈⁴⁶，

³⁶ 同³⁵五七頁。

³⁷ 據「蘇中關係」一書透露，邊境糾紛在一九六一至六二年有案可稽者有好幾千件，六三年達四千次以上，二〇七及二一九頁。

³⁸ 「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北平「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

³⁹ 同³⁶二五六頁。

⁴⁰ 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北平「紅旗」雜誌一九六五年第十期。

⁴¹ 同³⁸。

⁴²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年報——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北平「人民日報」。

⁴³ 周恩來在羅馬尼亞駐北平使館招待會上的講話（一九六八年八月廿三日）——一九六八年八月廿四日北平「人民日報」。

⁴⁴ 毛澤東：「中國要成為世界革命的兵工廠」——「毛澤東思想萬歲」六八二頁。

⁴⁵ 同⁴²。

⁴⁶ 此一數字為張春橋一九六七年九月在所作「國際形勢傳達報告」中所透露，引自彭士諤：「匪俄關係的演變」一八五頁。

⁴⁷ 據「蘇中關係」一書透露，一九六七年邊境衝突約二千多次，較上年增加兩倍；一九六八年一至二月九十件，至五月中旬增至一六四件，該書三二二及三三二頁。

另據 Harrison E. Salisbury 在「蘇中『戰』」（War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一書中所引中共數字，從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日至六九年三月十六日，共有邊境衝突事件四千一百八十九件。

又反映雙方在滲透與反滲透的地下戰場上，也有激烈搏鬥。而一九六六年秋季至六八年春季，雙方更使用包括包圍及衝擊對方使館、驅逐及毆打對方外交人員等手段，互相挑釁。據莫斯科統計，一九六七年較大衝突事件即達二百多起^⑧。這種衝突再加上雙方互撤大使，貿易連年急劇下降，以及文化交流的停頓，毛蘇「國家關係」也惡化到瀕臨決裂的邊緣。

一九六九年三月，爆發珍寶島事件。五月，武裝衝突擴大至西線的新疆邊境；到了八月，在整個邊境地區衝突迭起，情勢極為緊張。但雙方迅即從戰爭邊緣撤退，十月起就邊界問題舉行談判。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共與蘇聯都一再聲明，繼續黨際鬥爭，同時本和平共處原則，改善「國家關係」。惟邊界談判一拖七年，至今仍停留在起步的地方，未獲絲毫進展，「國家關係」也沒有多大改善。共產制度下的黨與國家關係無法截然分開，要撇開黨際爭執，單獨謀求國家關係的正常化，乃不可能之事。但毛蘇此舉也顯示它們都想把拉緊的弓弦放鬆一些，不打算全面決裂。

珍寶島事件後，蘇聯將在遠東的軍力從十五師增加至四十五師至五十師之間^⑨，中共也自一九六九年秋季開始加強防蘇備戰，毛蘇衝突從此升高至軍事對峙狀態。然而，北平在軍事上只能採取守勢，莫斯科增兵的目的也不在求戰，而在以持續性的強大軍事壓力，結合幾乎是周期性的和平試探，達到某種政治目標。蘇聯將打擊鋒芒集中於毛澤東個人，顯示其對與毛重拾舊歡已告絕望，故轉而將希望寄託於毛的反對派及毛死以後。軍事威脅結合和平試探，另外加上外交包圍與政治滲透的總體性攻擊，即在警告北平，沿着毛的反蘇道路再走下去，必須付出極高代價，冒核子毀滅的危險，而和解之門並未關閉。從而將毛蘇關係與中共權力鬥爭連在一起，影響並助長反毛勢力，在毛生前或其死後，促成其對蘇政策的有利轉變。

毛澤東對莫斯科的計謀知之甚稔，其對策在對內方面，是把所有反對派首腦，包括劉少奇、林彪和鄧小平，都打成「裏通外國」的判徒。一九七三年八月，周恩來在「十大」的政治報告，公開譴責蘇聯企圖顛覆中共的領導，指控林彪「投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並強調中共黨內「還會出林彪，還會出王明、劉少奇、彭德懷、高崗這一類人物。」這些人除了王明和高崗，其餘幾個皆無有力證據，證明他們確實曾與莫斯科串通反毛。但無論這項指控是確有其事，還是故意羅織罪狀，都表示毛已提高警覺，防範反對勢力與蘇聯勾結，並在整鬥他的政敵的運動中，將主張同蘇聯修好的人，也列入要清除的黑名單之內。進入一九七〇年代以後，邊境糾紛雖時有傳聞，惟未見發生重大事件。不過，北平政局一有變故，邊境各省立即呼籲注意防制莫斯科的滲透顛覆活動，最敏感的新疆地區，更強調其「主要的威脅來自蘇聯現代修正主義」^⑩。除此而外，中共並指控蘇聯外交人員從事間諜活動，密謀建立顛

⑧ 據「蘇中關係」一書透露，僅一九六七年一年間，較大的「反蘇挑釁」約二百餘件，該書三二二頁。

⑨ 據一九七六年三月廿五日「日本時報」刊載合衆社波昂特稿，所引前中歐盟軍統帥基爾曼瑟將軍 (Gen. Johann Adolf Gunt Kiehlmann) 在漢堡外交政策季刊撰文所列數字，自一九六九年烏蘇里江事件後，蘇聯在遠東兵力已由十五師增至四十五至五十師之間，一九七三年中期後已漸緩慢。

⑩ 一九七六年八月一日中共新疆電台廣播。

覆組織⁵¹。雙方在這一地下戰場的角鬥仍極激烈。

在對外關係方面，一九六〇年代後期，中共受到來自北方的蘇聯軍事壓力，也受到美國在亞太地區軍事部署的威脅，可以說，中共是兩面受敵。毛澤東的對策是：改變因應白宮的對策，與尼克森進行低盪，消解南方的軍事威脅；並借華盛頓之力牽制莫斯科，緩和北方的軍事威脅。與此同時，在亞洲，擱置將美國全面逐出亞洲的政策，讓山姆大叔留下來阻擋蘇聯。其次爭取日本，作為反蘇的伙伴和前鋒。如此即可破壞莫斯科圍困中共的計劃。在歐洲，阻撓西歐與蘇聯和解，不讓克里姆林宮的西守東攻計謀得逞，把這股禍水困在西線，以減輕其對北平的威脅。在第三世界，以外交游擊戰困擾蘇聯，並與之爭奪這一極具戰略價值的重要地區。這就使北平與莫斯科針鋒相對，在世界各個地區展開外交角逐。

然而，無論蘇聯或中共，都採取與全球戰略相適應的政策同對方周旋，沒有忽略對付非共世界。莫斯科始終以美國為假想敵，布里茲涅夫世界戰略的優先目標，是在軍事和經濟戰線上趕上並超越美國；其次，是運用暴力革命、和平過渡謀求擴展，並以第三世界為主要目標地區。他計劃從這兩方面促進國際力量的有利轉化，取得壓倒美國的優勢。其對華盛頓及西歐的和解政策，即在執行這一戰略計劃，並非單單為了打擊中共。與黑魯曉夫時代相比較，北平與莫斯科的對立雖然益趨尖銳，但布里茲涅夫對外擴張的步伐，非僅沒有緩和，反變得較前激進。

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毛澤東在兩面受敵情勢下修改其世界戰略，雖基於安全防禦的需要，但也具有攻擊意圖。毛計劃從兩方面改變北平在世界權力結構中的劣勢地位⁵²：(一)加速國防與經濟建設，在本世紀內使中共成為另一個共產強權⁵³。(二)毛的「三個世界」論及其聯美制蘇、聯日制蘇、聯西歐制蘇的攻擊目標，是在西方三大勢力與蘇聯之間蹈瑕抵隙，有時也在西方大勢力之間蹈瑕抵隙，挑撥這四個世界權力互相爭鬥；主要是將美國推向反蘇最高線，挑撥兩個巨強的爭鬥，使在長期纏鬥中消耗力量，由強變弱。中共則乘兩強對峙的有利時機，避實擊虛，逐步將第三世界納入其勢力範圍，形成以北平為中心的第五個世界權力，而由弱轉強⁵⁴。這基本上仍是以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戰略的舊調重彈。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曾利用國軍與日本的長期對峙，在劣勢狀態下維護中共的安全，並發展農村割據，擴張軍事力量，爭取與軍，促進與國民政府間敵消我長的力量轉化，為後來的武裝叛亂做好準備。今昔對照，假如把華盛頓當作重慶，北平當作延安，莫斯科當作東京，不難發現毛正將這套早年對內行之有效的戰略，用來肆應今日的國際變局，而其攻擊箭頭不僅是指向蘇聯，也指向美國。

⁵¹ 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北平新華社「國際時事綜述」第三節「蘇修卑鄙的間諜勾當」。

⁵² 「霸權主義決定不了世界歷史的命運」——北平「紅旗」雜誌一九七三年第十期。

⁵³ 周恩來在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日北平「人民日報」。

⁵⁴ 三個世界論鄧小平在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的發言所提出（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一日北平「人民日報」），喬冠華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日在天津對該市及河北省重要幹部的講話透露，此係根據毛澤東對世界的基本看法：「現在是一個世界，兩家子，三分天下，四個矛盾，五種力量」。

毛蘇在共產世界的爭奪仍在進行，但較前緩和，非共世界則成爲它們外交戰的主戰場。中共的反蘇作爲是宣傳多於行動，這可能由於它在亞洲以外缺乏影響力，只能以罵來反對莫斯科；其次，面對克里姆林宮的強大壓力，不敢過份刺激對方，正如喬冠華所說「罵不等於戰鬥」⁵⁵，而罵若能打到敵人的痛處，也可以造成傷害；最後，用激烈的叫罵把自己裝扮成反蘇的急先鋒，又可以投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之所好，以謀取利益。北平阻撓美蘇和解，煽誘華盛頓同莫斯科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⁵⁶，就是利用這種姿態。在行動方面，中共只對與其安全有重大關連的問題採取攻勢，在第三世界的外交角逐，遇到與蘇聯有直接衝突危險時迅即撤退（如安哥拉）。

蘇聯的行動較少顧忌，並較具攻擊性。雙方在越南、寮國、莫三鼻給、安哥拉等地區的爭奪戰，都限制在競相支援及爭取當地共黨與左翼勢力，在中東則競相支援及爭取巴游組織，這種援助競賽的結果已是有目共睹。它們也競相拉攏第三世界及其他地區的非共國家和政治勢力，只要有利可圖，即連極端反共的國家和極右勢力也要爭取，惟其實際行動，皆未越出共黨通常與敵人妥協所容許的限度，也未作任何承諾，足以對該國共黨與革命運動，構成多大損害。東南亞、非洲等地的情况，就是這樣。而對某些重要國際問題，如越南問題、韓國問題等，毛蘇的抉擇都包含對意識形態的考慮，並保持基本上一致的立場。其他如蘇聯對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決定，也受這一因素的制約，設若不是同屬共產政權，單從國家利益考量，蘇聯就不會投票支持中共。這些事例證明，儘管北平與莫斯科尖銳對立，在外交戰場上自相殘殺，但它們的決策和行動，仍然受到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異中有同。

五

毛澤東死後，莫斯科立即改換笑臉，停止宣傳攻擊，並由蘇共致電中共，對毛的死亡表示深切哀悼，這顯然是在試探恢復已中斷的黨際關係。接着宣佈蘇聯不僅願遵循和平共處原則，與北平改善國家關係，而且願在一定條件下，與北平「發展爲符合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原則的善良關係」。它提出的條件是：中共「回到以真正馬列主義爲基礎的陣地，放棄敵視社會主義國家的方針，並站在同社會主義國家合作與團結的道路上」⁵⁷，繼而又具體指出：中共應恢復「八大」的內政外交路線，其中包括「用一切辦法，發展同蘇聯、同社會主義友好大家庭的兄弟友誼與合作」⁵⁸；應反帝而不反蘇⁵⁹。進入十月，莫斯科廣播又以溫和語調及影射方式，批判毛的不斷革命論、暴力萬能論與三個世界論，指其與真正馬列主義沒有絲毫共同之處。這仍然是要北平拋棄毛思想和毛路線，而對這一原則問題，克里姆林宮不擬作任何讓步。但與此同時，莫斯科復強調過去蘇援對中共建設的重大貢獻，顯示其有意以恢復

⁵⁵ 引自喬冠華的天津講話，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料室有其全文。

⁵⁶ 鄧小平在歡迎福特總統宴會上的講話——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日北平「人民日報」。

⁵⁷ 「始終不變的原則方針」——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莫斯科華語廣播。

⁵⁸ 「確立中國（共）的光明前途的代表大會」——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莫斯科華語廣播。

⁵⁹ 「反蘇主義是帝國主義的武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莫斯科華語廣播。

經濟援助，引誘北平入彀。

中共退回蘇共的唁電，表示不擬與之恢復黨的關係。九月十五日，華國鋒聲明繼承毛澤東的遺志，繼續奉行毛的不斷革命論及其所定內政外交路線；他提及反霸的時候，並將蘇霸放在美霸的前面⁶⁰。這是中共領導首次指認蘇聯為第一號敵人。喬冠華跟着吹噓毛的三個世界論，重申北平將堅持毛的「革命外交路線和政策」⁶¹。而毛死去至今，北平的反蘇宣傳戰從未間斷，華國鋒取得繼承地位後更變本加厲。它指斥布里茲涅夫與黑魯曉夫乃一丘之貉，其反蘇鬥爭將「長期進行下去」，一直要「鬥到修正主義在地球上絕跡」⁶²。這似乎已緊緊關閉和解之門，沒有轉圜的餘地。然而，華國鋒的權力地位並未穩固，爭奪繼承權的搏鬥仍在持續之中，值此過渡時期，不論華國鋒或其政敵，都要抱着毛澤東的靈牌，打着擁護毛思想和毛路線的旗號，不會劇烈改變內外政策。將來是否改變或如何改變，及其變或不變對北平與莫斯科的關係有何種影響，不僅取決於那一派贏得繼承權，更取決於影響它們分合的許多基本因素的變化。

克里姆林宮寄望於在毛死之後改善與北平的關係，值此中共面臨繼承危機之時，它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不加干預⁶³。假使莫斯科能支持親蘇勢力奪得繼承權，則阻礙中共與之修好的各種因素或已消失，或被強迫擱置，雙方關係可獲改善。但中共高階層能够接納克里姆林宮建議的人已被毛整肅殆盡，華國鋒連江青也打成「裏通外國」，顯示他已決心在清算江青運動中，連帶壓制有意與蘇聯講和的人。缺乏強有力的內應，莫斯科實在力不從心。在軍事干預方面，中共在美國對此皆已提出警告⁶⁴，顯然已加注意。惟蘇聯指季辛吉國務卿所作中共如受到大規模攻擊，美國不能袖手旁觀的聲言是「政治謊言」，並重申其無意用兵⁶⁵。這可能是真話，不過，在邊境地區製造事端，以加重對北平的壓力，其可能性也不宜低估。

雙方對意識形態的衝突仍各持己見，不肯退讓。在這一方面的爭端，其對外部份經過布里茲涅夫之往「左」修正，毛之往「右」修正，如果抽掉其中相互為敵的內容，兩個戰略與策略的基調已相當接近。但是，原有爭端的對內部份，由於毛之提倡不斷革命論，極端轉向左傾，其距離却越來越遠。如果華國鋒能够將殘餘的文革派勢力聚合起來，建立左派的穩固統治，這距離將無法拉近。即使由與克里姆林宮在意識形態方面最接近的一批人掌權，也有困難。由於今後相當長時間內，沒有人能具有毛同樣的個人權威，還要利用毛的偶像地位鞏固其權位；而北平與莫斯科意識形態的分歧，除了毛的個人因素，還有發展階段的不同、現實利害的矛盾等很多原因，這些原因並未因毛之死亡而告消失。因之，縱使雙方都有誠意消弭歧見，也只能做到把距離縮短一些。

⁶⁰ 華國鋒在毛澤東追悼會上的悼詞——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北平「人民日報」。

⁶¹ 喬冠華在聯大第三十一屆會議的發言——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北平「人民日報」。

⁶² 任古平：「堅決反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北平廣播電台十月十日播。

⁶³ 參閱史卡拉賓諾（Robert A. Scalapino）：「中共與權力均勢」——美國「外交季刊」一九七四年元月號。

⁶⁴ 「新沙皇採取攻勢就埋伏着失敗」——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北平新華社記者述評。

⁶⁵ 「關於季辛吉的報導所作的一篇評論」——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莫斯科華語廣播。

中共不管那一派當權，都不會像毛一樣熱衷於爭奪共產世界的領導權，這一衝突因素可能減輕。不過，不管是那一派掌權，也不會恢復一邊倒的關係，再受蘇聯的控制。莫斯科欲將北平拉回到它的「大家庭」，必難如願。回顧過去，在一邊倒前後，毛澤東曾在享有相當自主權情況下，屈從史達林和黑魯曉夫，維持不平等的同盟關係。布里茲涅夫可能循同一途徑，謀求與中共新領導重修舊好。可是，今日情勢與當年迥異，當年毛受制於莫斯科，是因為有求於人，不得不委曲求全；如今既已擺脫控制，又不需要仰賴蘇聯，沒有理由接受這種屈辱的安排。北平即使有意同莫斯科重建盟誼，也必定堅持以完全平等為結盟基礎，但這絕非蘇方所能同意。退一步考量，按照莫斯科的構想，使中共重返「大家庭」乃其「發展」目標，而第一步只求改善「國家關係」。論者有謂：如果能夠把意識形態的爭端凍結起來，通往國家關係正常化的道路就可能暢通^⑥。鑑於北平需要鬆弛緊張狀態，蘇聯與南斯拉夫關係又曾使用此法獲得改善，其可能性確實存在。惟中共與莫斯科意識形態的差別，遠較蘇南之間的複雜而嚴重，牽連也較廣，雙方因意識形態分歧所形成對內對外的各行其是，往往對對方利益構成重大傷害，從而導致衝突。毛蘇過去致力改善「國家關係」，而鮮有成效，這是個重要原因。因之，採用南斯拉夫模式，也有不易克服的困難。

阻礙中共與蘇聯和解的因素還有：（一）邊界糾紛導源於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衝突，後來演變成爲一主要爭端，極難解決，而現在不用說要重新結爲盟友，即連恢復「國家關係」的正常化，也需要對這個異常棘手問題取得妥協。（二）長期尖銳對立所造成的仇視、猜忌及不信任心理，非短時期所能消除。（三）莫斯科的戰爭邊緣政策不足迫使北平屈服，其經濟援助對深受蘇聯斷援之害的中共也極少刺激作用。克里姆林宮利在速決，但不論是威脅還是利誘，都缺乏足夠的本錢。而緊張情勢若能緩和一些，還是毛澤東十二年前決定的「拖」，對中共最爲有利。

據此推測，設若北平與莫斯科都有誠意和解，可能仿照南斯拉夫模式改善「國家關係」達成比蘇南關係多少要差一些的正常化關係，不會走得再遠。假如此路不通，可能如一位日本專家所預料，演變爲同美蘇和解極爲相似的緊張緩和狀態^⑦。假如這條路也走不通，則將繼續對立，但將維持目前以軍事爲後盾的政治對抗局面，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不大。中共在軍事上將仍採守勢，蘇聯只有在三種情況下才會訴諸一戰：（一）政治解決完全絕望，而軍事力量已擴張至有必勝把握，不再恐懼外力干涉；（二）已做好內應準備，利用一次軍事突襲即可幫助中共親蘇勢力取得權力；（三）北平在外交方面劇烈轉向（如與美國締結軍事同盟），對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惟這三種情況都極少可能出現。然而，就長期觀察，中蘇兩個共黨雖有自相殘殺的爭鬥，畢竟同一源流，其最終目標仍相一致，即是要埋葬資本主義。某些可能發生的變化，例如中共的軍事及經濟力量，若能成長至與蘇聯相當的實力地位；又如非共世界的穩定與快速發展，使它們發覺唯有聯合起來才有前途，則意識形態等分離因素，也有可能轉變爲結合因素。而這種變化的基礎一旦奠定，即非任何外力所能影響。研究北平與莫斯科關係，對這些特殊因素不宜忽略或低估。

^⑥ 華德·克里門斯二世 (Walter C. Clemens Jr.)：「和解對中共與蘇和的影響」——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出版之「國際事務雜誌」第二十八卷第一期（一九七四年）。
^⑦ 小泉貞之：「中蘇關係展望」——日本「外交時報」一九七五年第三號（總號二二二三），原名在作者姓名下註明爲筆名。